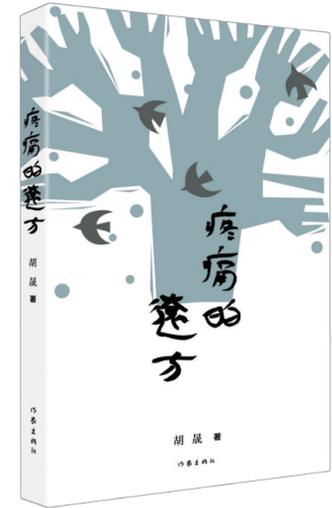


■ 聚焦

作为一位诗人，需要敏锐的艺术感受，这种感受来自一种触觉唤起的敏感程度，胡晟的敏感程度显然高于一般人，那些触动他诗感的元素常常来自日常生活的赐予。在读他的诗集《疼痛的远方》时，我发现他诗意的触角极其发达，既能够在乡村的记忆里找到诗情与厚意，也能在亲情中感受到大地慈爱而厚重；既能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那些隐藏诗意的角落，也能在工作的烦琐甚至厌烦处挖掘出诗情和哲思。

今年春节，我去给王蒙先生拜年，王蒙先生问我对其诗歌论战的看法，我说评价一个诗人的优劣不是看他最差的诗歌，而是要看他写得最好的诗歌，如果以最低处确定一个诗人的“段位”，不用说郭沫若等诗风变化较大的诗人会难逃诘责，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也有很多随性之作、随意之作。对一座山峰的高度的认定，是以它的海拔作为最后的标准，而不是山腰的亭子和水池，也不是山顶上空飘动的气球。王蒙先生点头：你说得有道理。

依据这一原则，我在这里不想全面地评述胡晟的诗歌，重点谈一谈他书写母亲、书写亲情以及乡情的诗歌。这些诗歌表现了胡晟的诗感高度，代表他最好的诗歌水准。真情出诗人，胡晟写母亲的诗歌很多，完全出自真情的流露，这种真情的流露是人的天性，也是诗歌的内在本质之一。虽然现代派诗人艾略特说诗人不是表达情感是要逃避情感，诗歌不是表现才华而是要逃避才华。艾略特的话，其实是针对浪漫主义诗人的滥情而言的，是对那些过分雕琢的无病呻吟的技巧派而言。逃避本身恰



恰说明诗歌源自真情，无情难以成诗。胡晟的诗对母亲的爱如此深沉：“当一片蛙声把一枚荷叶顶出水面时/荷花分娩了六月/母亲分娩了我”。这样的血肉之情写得浪漫而清新，“荷花”“六月”“蛙声”记录了那样一个平常而又平常的日子，一个孩子的诞生，对这个世界来说，增加了一个新的生命，而对于母亲来说，也是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胡晟善于书写真情，但真情不是直抒胸臆，直抒胸臆正是艾略特所言的需要逃避的，真挚的感情要通过意象来呈现，才有味道。胡晟善于捕捉意象，善于转虚为实，

诗情翻腾母爱光芒

——读胡晟诗歌集《疼痛的远方》 □王干

转实为虚，情思哲思交相辉映。这本诗集的第一首这样写道：

夕阳被稀饭熬烂
糊里糊涂粘着岁月
在薄薄的云层里
翻晒着自己的阴霾

父亲将一天的收获和疲惫
扛回了家
母亲打下收条
然后捧一把唠叨
小心翼翼地擦洗
父亲满身的尘埃

炊烟赶走了夕阳
占据了整个村子
傍晚傻傻地等待
明天升起太阳

在这首诗里，作者表达的也是母爱、父爱，对亲人的热爱和思念，但诗人巧妙地将这种感情转化为乡村的生活图景，“夕阳被稀饭熬烂”，如果按照一般的语法逻辑是难以理解的，但诗歌的语法是意象的语法，是心灵的语法，“夕阳被稀饭熬烂”，交代了时间，交代乡村的饮食的特点，一个“熬烂”堪称“诗眼”，夕阳西下，晚霞在缓缓地燃烧，而母亲正慢慢地熬稀饭，等待着亲人的归来。黄昏时分的乡村场景，父母劳作的辛苦，亲人之间的温情，全在短短的诗句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胡晟写母亲的诗篇不多，而且时有金句出现：
站在家门口
母亲把目光

擦得锃亮

《归家》

我的骨头像母亲的骨头
像织布机的骨头
脸，像母亲用黄栀子染出来的布

《一颗米汤》

月光下
故乡很亮
母亲把皱纹铺成一条小路
我沿着小路回家

《归——写在中秋节》

胡晟这样的句子凝聚着对故乡的爱，对母亲的爱，我们在读的时候，仿佛目光也被擦亮了，原来人类的爱如此日常，又如此深藏。胡晟作为一个游子，作为一个孝子，他的爱温暖而悲悯，仁慈而苍凉。

前不久，我在谈论诗人何鸣的诗集《自画像》时说到是诗意照亮生活，还是生活照亮诗意，是诗歌的不同的取向。胡晟属于诗意照亮生活这一派，他在生活当中到处找到诗意的存在，收在诗集中的其他诗篇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主观诗人的“照亮”生活的情怀。他以强烈的主观的情怀去浸泡生活、记忆和经验，所以他的诗有着强烈的修辞意味，“炼字”“炼句”的中国古典诗歌的作风非常明显，以至于他的诗歌呈现出来的是语言的阵痛伴随着意象的诞生。前面说到的“荷花分娩了六月/母亲分娩了我”，也是他诗歌创作的写照。

所以他把诗集取名为《疼痛的远方》。对一个诗人来说，一首诗的诞生，也是一次分娩、疼痛，但远方的憧憬，远方的期待，远方的爱，才是诗永恒的魅力。

北京，所恋的故乡

——读王海滨散文集《北京人》

□尹小华

品读王海滨的新书《北京人》，令人犹如身临其境地融入到北京这座古城之中，沉浸在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和鲜活的现实生活的氛围里。一时间，各式各样的人物活灵活现地呈现眼前，让人目不暇接，仿佛感受到了他们似吟似唱的话语和若隐若现的表情。

全书由42篇散文组成，20余万字。32开本，小版心、大行距，封面素雅，给人赏心悦目之感。在《北京人》开列的名单里，我们可以看到黄孝影、李健、于蓝、于洋、谢铁骊、杨静、古月、周迅、黄小雷、张铁林、李冰冰、叶大鹰、乔梁等名人，也看到了保安、农民、校长、的哥、艺人、匠人等普通人。在王海滨看来，他们身上既闪烁着耀眼的荣誉和光环，也充满着酸甜苦辣的人间烟火。正因为如此，这些人材才真实可信，乃至可爱。

《北京人》作为多篇目的集合，更能考验一个作家创作视野的开阔度和综合性能力。书中聚集了各式各样在北京做事或谋事的人，涉及他们的艰辛历程、脾气秉性、审美好恶、生活习惯等诸多话题，展现出他们五味杂陈的人生，以及各自的喜怒哀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散文集也可以被理解为采用分散式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像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脊椎，连接着书中人物的筋骨和血脉，在人生这个大舞台上，演绎着不同的角色。

从2000年初王海滨考入北京电影学院以来，至今他在北京已经工作和生活了20年，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和人生积淀。从他笔下不同人物身上透射出来的闪光点，组合成了点缀这座城市的一片星河。

真挚美是其散文的精神内核，文学与艺术交融形成了作家独特的创作风格，使作品富有新鲜感和感染力。王海滨的写作是切肤体验的文字投射，语言清新自然，意蕴深远，简约质朴而又直击人心。

鲍勃·迪伦有言，“有些人能够在雨中感受到诗意，而其他人只被雨淋湿。”王海滨就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具有捕捉生活细节的能力，他总能发现常人难以察觉的生活之美、人性之美，使每一个细小的场景、人物、故事等，都烙印着他对于人生的深入思考和鲜明的人生态度，呈现出生命的温度。

王海滨初中时就熟读了《红楼梦》，闲暇时还喜欢把其中的情节与时下的人和事结合起来加以评述，最后总爱用“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作结束语。在一线当记者后，每每遇到采访对象，从三言两语中，就能洞察到对方的内心世界；从一颦一笑中，就会捕获到对方的情绪性格。无论多么难以接近的人物，王海滨都能在最短的时间找到一个与其交流沟通的突破口，使每次采访都能顺利进行且挖掘深刻。《北京人》正是这样挖掘和描摹出来的。

或许还得益于王海滨多年的媒体职业。事实上，有文学底蕴的作家很少是单一化写手。王海滨当过记者，做过编剧和导演，还拥有一部小说、散文、剧本的写作历程。透过《北京人》，人们可以触摸到作家生命的温度，那既是人生旅途中的鲜活记忆，又是乐观向上的人生境界。王海滨是用心写作的作家，写作也就成了他慰藉灵魂的最高奖赏。王海滨已出版散文集《清水无香》、长篇小说《朝花夕拾1990》等有一定影响力的作品。他认为，写作就是心灵在歌唱。

通观这部散文集，每一个人物既相对独立，又隐隐相连，命运走向既有偶然性，也存在生发的必然。我们能听到欢喜，也能听到叹息。作者着眼于人物故事和命运的复杂性，把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呈现给读者，本身就体现了作家的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

“所恋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故乡了。”此言解开了王海滨的乡愁心锁。《北京人》滴水见太阳地折射出北京人的新风新貌新气象，旨在通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让广大民众深化对北京的认识和了解，使北京成为我们共同

守得云开见月明

——为子嫣《岁月的彩虹》序 □黄国辉

我最早读到子嫣的作品是她的散文，更偏向于文化散文的类型，她对西藏传统文化有很深的研究，这成就了行文中的淡定和从容，文字空灵而又缠绕，像绕于山间的闲云，看似散淡轻盈，却总让空阔壮美的山川欲罢不能。及我读到她第一篇比较完整的报告文学作品，就是这本《岁月的彩虹》中收入的《浴火重生——西藏日喀则“4·25”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时，那一刻甚至有些吃惊，是因为我对她在文字场景中能完成快速转圜的由衷敬佩。当然，我也就此得以再次在她另一类型的文字里，管窥她作为作家的全面。

发生于2015年的“4·25”地震，在西藏日喀则市部分地方造成了人员伤亡和极严重的破坏。地震后的一段时间，国家投入很大的力量对受灾地区开展灾后重建，这也是近些年来西藏聚力于民生的一项重要工作。作家深入到灾后重建的第一现场采访创作时，眼见的已经是一派平静而有序的繁忙景象。进入子嫣的这篇文字，灾难的现场便转瞬之间又回到眼前，摇晃的房屋，崩落的巨石，腾起的烟尘，撕心裂肺的哭喊。她的叙述里，文字是激荡着的，跳跃着的，是带着声音和表情的，是柔软的，也是坚强的。她以人入镜，见微知著，使灾难背后的坚定与果敢、悲悯与温情都跃然纸上。在西藏的几年间，我一直很想去看看灾后的樟木，主要就缘起于她的文字，可惜一直未能成行。

回到整本书，想说的是子嫣作为作家，在与这个时代同行中的宽阔与包容。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最快速、最直接、又最全面地与时代对接和呼应的文学体裁，可以说既好写，也不好写。好写，是因为只要肯去挖去采，题材素材会如地下泉涌，浩浩不绝。说不好写，那是因为如何把这些题材组合起来，使之既具纪实性特点，又有文学性的创造，确实很难。

好在，我在子嫣的这部《岁月的彩虹》里看到了她的坚持。子嫣浸染于西藏的高原环境之中，把自己的精神和灵秀都灌注于这片文学沃土。某种意义上说，西藏的作家队伍中，她一直走在跟进和把握时代的前沿，这不仅得益于她从小生长于陕西那片文学富矿中之所得，更在于她着眼于现实，贴着高原行走的作家的责任与初心，在于她自身作为写作者的自律与自觉。

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给隆子县玉麦乡卓嘎、央宗姐妹回信，鼓励她们继续传承爱国守边精神，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家园的建设者。受西藏文联委派，我作为领队与西藏的作家艺术家们一起到玉麦采风采访。那一路，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子嫣身为作家的职业素养。人冬的玉麦寒意逼人，曾经的“三人乡”虽然当时已有十几户人家，但住宿和生活条件仍然十分艰苦。子嫣不仅不曾为这些所困扰或有丝毫抱怨，反视之则为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因为不懂藏语，子嫣会拉着同行的藏族作家一起走门串户，一个小小的笔记本短短的时间内记得密密麻麻。采访过程是非常体现作家功夫的，有时候我会觉得获得的信息已经很饱满精到了，她仍然会有一些不知从哪个角落里冒出来的问题，听完又会觉得，是啊，是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及后来看《西藏文学》首发她的这篇《太阳照在玉麦乡》时，其中很多丰富的细节都让我深感惭愧。我之前一直在跟她谈，我心里也有一个想凝成文字的玉麦，好几次想动笔，到现在却仍然滞顿于笔尖，已经羞于再说了。

一个作家，特别是报告文学作家，没有内心对题材的情绪应和和充分调动，是不可能有这样的感悟力和建树的。在这一点上，子嫣确有其独到的能力。无论是此书中写到的可爱可敬的拥军老阿妈，还是德艺双馨的文艺名家，无论是横跨几千里的爱情，还是经久传承的藏医药，都能够成为她涉猎的内容，足见她对高原创作题材和人文环境的精熟。而作品中所体现的重大题材的宏大叙事与人物细节表现的有机结合，个人命运与时代特征的紧密关联，作家个人联想创造与现实场景的交融汇集，都成为她这批报告文学作品最为显著的特点。

作品里，也能看到子嫣在创作中不断地进行的一些尝试与探索。在《太阳照在玉麦乡》中，不同叙述视角的转换像是一个立体打印机一样，不断地构筑出桑杰曲巴老人一家和玉麦乡几十年来的多维度的画面，使这个小故事讲出了大气魄、大格局。在《雅鲁的欢唱》中，多个典型人物选取恰如其分地铺垫并凝聚起表达，使藏医院发展这样一个本显微的主题焕发出别样的鲜活。在《天边阿里盛开的民族合欢花》中，选材的独到以及对人物性格心理的精准探源，使作品的可读性大大增加，主题表达得到了出其不意的强化，等等。可见子嫣在创作中是不停思考着、衡量着、审慎着的。报告文学虽然往往需要直陈要害又不吝字句，但也可以看到她到在许多处的婉转腾挪和惜墨如金。所以我相信，创作中的她，一定始终秉持着一份对文学与时代的敬畏。

同时，作为一个以西藏为精神家园的作家，子嫣无疑在创作中也享受着独到的幸福。我在西藏的几年间也深深感到，西藏在新时期的发展，以“一日千里”来形容不为过。这片土地上发生着的变化，那些只与她擦肩而过的旅游者只是见证者，却无法明白其中蕴含的历史深意，那些断裂历史品头论足的浅见者更只是井底之蛙。一个作家，只有真正地匍匐在高原之上，不断地吮吸着时代的养分，真正去感受那里一点一滴发生着的变迁，感受老百姓脸上的一颦一笑洋溢的幸福，才会摸索到属于新西藏的精神高地，打开新西藏的文学之门。就此而言，子嫣的报告文学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她对时代观察的深入与全面，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现了新西藏在时代主题上的丰富与博大——她是自己创作最大的受益者，也是一个慷慨的精神分享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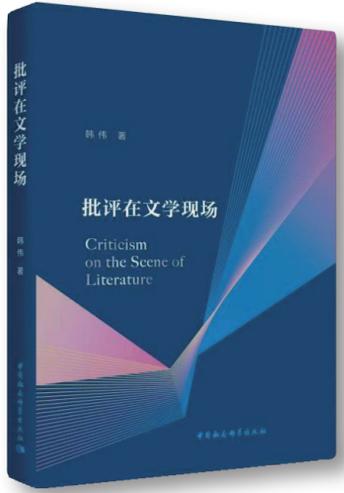
当然，我作为子嫣的一个读者，赞赏她对文学的执著和对时代的热情之时，对她的文学成就也并不敢妄言与武断。我相信，子嫣此次奉于读者面前的这本集子，于她内心而言，更像是给自己所坚守的精神世界的一份答卷。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完成，随着西藏这个全国贫困发生率最高、贫困程度最深、扶贫成本最高、脱贫难度最大的区域也终随着全国人民一起与小康牵手，一起迈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规划的更加美好的前景，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节点上，《岁月的彩虹》或许只是子嫣关于西藏题材报告文学作品的一个良好开端。未来，仍可期待！



感性体悟与理性反思的契合

——评韩伟《批评在文学现场》

□廖宇婷



当代社会文化的大众化、多元化以及电子媒介的普遍应用，促使视觉文化日益勃兴，人们沉醉于声音的渲染、图像的冲击和虚构的幻象之中，精神充满了空虚与荒诞之感。文学开始沦为图像的脚步和配角，这更加速了文学的失语和文学批评的失声。文学的历史语境被忽视、理想诉求被集体无视、感性表达排挤理性思维，以及理论批判脱离文学现场的现象比比皆是。基于此，韩伟先生在他的文学研究新著《批评在文学现场》（2020年5月版）的代序《文学应该理性地表达“理想”》中明确提出：“文学就应该表达和书写阳光的、积极向上的人生理想，从而让读者在这种文学的阅读中，获得精神动力。”笔者认为，文学应该成为时代精神的表征，应该理性地表达和书写“理想”，进而真正激发人们实现“中国梦”的豪情和壮志。

韩伟先生对当下文学表达的模糊、含混，颓废与无力等问题的认知非常清晰。他痛斥文学的阅读带给人们不是“诗意的暖流”，而是“感官的刺激直抵欲望的肉身”。因此，他主动承担起“敲钟人”的角色，从“批评”“文学”和“现场”几个关键词切入构建起《批评在文学现场》的逻辑体系，强调文学研究不仅要有中国立场，还要与世界文学对接，不仅要感性思维，还要切实立足于文学现场，注重理性批判和哲学反思，注意回归历史语境、承担社会责任。该书共分四辑，第一部分“理论的诱惑”撰写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和“强制阐释”相关论题，表现了作者对当下中西对话的关注，以及对学术热点问题的学理性反思。第二部分“民国在文学现场”中，作者富有创新意识地强调了“民国性”内涵，从问题意识的转变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中试图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学术生长点。如果说第一、二部分是理论思维的张扬，那么第三、四部分便是对当代文学高屋建瓴式的双重描绘，亦是对具体文学作品和生命个体的现实观照。论著深入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堂奥，既有自我立场的坚守，又有时代语境的变通，是对批评精神的恪守，也是直面历史和未来的豁达与宽容。

深厚的理论素养和高瞻远瞩的问题意识，促使作者对理论前沿与热点问题进行了自觉探赜。韩伟先生立足于文论元典，融汇中西，兼收并蓄，直面当代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领域中的问题。在中

国古代文学理论层面，作者以反思的姿态，强调了“学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专业化”与“个性化”的学科自觉，并辩证地论证了“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内在融通关系，以及“本土性”与“世界性”之间的理论张力。著者在多维视野的融合中，自觉地践行着中国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为中国古代文论的重构提供了创化路径。在西方文学理论层面，作者坚守中国立场与民族立场，直面中国现实状况与理论问题，提出应该在观念和方法上进行革新，反对“以西解中”的“单向格义”，以多线性、开放性、反思性和批判性品格推进当代文学研究。可以说，韩伟先生的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国文学的理论自信，推动了中国文学研究的原创新和实践性。

宏大的历史视野与理性的批评意识是该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如果没有历史真实作为研究的基础，没有客观的价值和主观的社会责任作为依托，那么文学批评家的理论将会空洞无物，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韩伟先生强调不能“简单意义上地回到历史中去，而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历史细节，最大限度地贴近历史真实。”文学批评要跳出阶级斗争的观念，返回作家精神世界，发掘作家的创作动机，将“文学的内部与外部”有机地结合起来，承担批评家该有的社会责任。著者在思考和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实状况时，问题意识明确，从文学的时代性和人类性出发，突破固有的思想窠臼，坚持中国立场和中国方法，很好地诠释了中国特色和中国语境的文学文本解读的科学理念。可以说，韩伟先生具有强烈的理论自觉意识，他的论著体现了文学研究的反思性、学理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人文关怀的价值立场与超凡脱俗的个性批判是该著的另一个特点。韩伟先生在论著中多次提到“现代性书写”“叙事伦理”等相关术语，关注到了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对个体生活世界的侵占和挤压，也意识到惶恐的个体反作用于现代社会造就了社会的病态，“而这种病态表征着理性的失序和无限扩张所带来的现实社会的分裂”。因此，作者明确提出了文学应该反叛消费主义的同一化、刻板化，并及时“承担起将现实生活从庸俗同一的泥沼中打捞起来的任务”。例如，作者在《“70后”写作的三重视域》和《“阿基琉斯之踵”：“70后”作家的现代性书写》中都关注到了现代社会中，个体生存的艰难、主体意识消解、工具理性对人性的异化，以及文化工业对审美自由的剥夺等问题。作者深刻地认识到了消费主义城市空间的碎片化，导致人们生存悲剧的发生。所以，作者将眼光投射到当下现实社会，通过对《山本》《被掩埋的巨人》《浮世画家》等文学作品的多层批评与分析，呼吁人们透过文学作品所展现的想象世界，重塑现代社会的道德律令和伦理责任，使文学彰显出实现价值和意义。

诚如韩伟先生《批评在文学现场》中所言：“理想是神圣的、美好的，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的精神品格。”作者试图让文学极大地表达理想，让“理想”的逻辑链条在文学批评中自由舒展，以此来唤醒我们活的文化传统，去发掘人类精神的新的意义。与此同时，韩伟先生也特别关注文学理论的批判思维与理性反思，论著标题“批评在文学现场”就是对批评与反思意识的致敬。